



# 循着日常轨迹，走进情感腹地

——2024年散文读札

□王清辉

通过旅行、感情、阅读和生活经验本身的书写和回忆，我们在2024年度的散文写作中看到了文学回应世界的独特视角。行旅散文、传记散文、文化散文……散文世界的版图正在持续扩大。随着散文的边界日益模糊，更多的创作者参与到散文创作当中。散文观念和其他观念一样，只有不断变化才能充满活力。在这个过程中，若是我们勇于探究，那些模糊的记忆，那些被忽略的日常和情感里最幽微的角落，能够焕发出蓬勃的力量

四季如往常一样更迭，日子一天天悄然流逝。回首2024年的散文阅读，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过往的人生经验、当下的种种困惑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望，都在阅读中隐秘地相互交织、呼应。散文宛如时光宝盒，其间珍藏着喜怒哀乐。一旦我们从忙碌的日常生活中静下心来，仔细分辨，作品中蕴含的情感脉络与思想光芒就像明亮的火焰，点燃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喟与思考。

文学，究其本质，恰似我们脑海中一段段宝贵的回忆。我们在一次次的重写或重读中，就好像沿着记忆的小路蜿蜒漫步。在这个过程中，若是我们勇于探究，那些模糊的记忆，那些被忽略的日常和情感里最幽微的角落，能够一齐焕发出蓬勃的力量。

## 行旅散文的视域开阔

行旅散文的大量涌现是2024年散文阅读中的一大亮点。当下的散文写作借旅行与文学书写回应的是世界性的问题和眼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漫步旷野时所思想与历史文化意识相互交融，山河之思与家国意识就自然地同构起来。同时，散文中心怀好奇且心态开放的旅行者形象，以自己熟知的经验去探寻未知，再以新的感悟来反观当下日常，无论是以过客的姿态记录交流，还是借旅途小事展现思维观念，都让人对更大的世界心生感怀。

阿来在《去有风的地方》中踏入山乡，借自然环境展现时代巨轮在基层乡土留下的痕迹，偏远山坳成为他感知时代变迁的窗口。古老寨落周边的山水，承载着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自然成为文化与时代的天然载体。与阿来一样，借自然环境描写搭建起人与自然沟通桥梁的，还有陈应松《神农架野史》、傅菲《客居深山》等作品。无论是神农架还是笔架山，他们置身旷野，仿佛就能听懂自然的密语。当深入山乡僻壤，那偏远山坳的风、古老寨落周边的山水，都成为连接他们与当地文化、民族记忆的纽带。自然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外物，而是他们拓展内心、倾听万物生命之歌的对话者。我们在阅读中能深切感受到人对自然的融入，以及自然对人性情的滋养。

行旅散文是最能感受到“过往如异乡”之情的，像是刘子超《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班卓《陌生的阿富汗：一个女人的独行漫记》、库索《离岛：于偏僻之地重建生活》、杨潇《可能的世界》、柏琳《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姚璐《看不见的中东：深入日常生活的中东之旅》、王恺《地球上的陌生人》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借助他们的文字，我们仿佛踏上了穿越世界的奇妙旅程，在时间长河、广袤地理与深沉记忆间自由穿梭。书中的世界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地理概念，无论是巴尔干地区还是阿富汗，无论是日本还是南斯拉夫，其日常生活场景都能成为我们回望历史、凝视当下、展望未来珍贵的窗口。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聚焦于动荡且神秘的世界中个体的命运轨迹，对普通人的生活日常，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态展开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这些细腻的描述常常成为文章中最动人的笔墨。

朝颜的《古陵的舞者》聚焦非遗传承人，展现其生存困境与人性，记录在时代变迁中的探索与希望。王族的《狐狸有九个想法》借动物故事与牧民谚语，探索动物生命经验，传递自然共生的启示。这样厚实的书写，既与脚下的土地相融，又与土地之上的人紧紧相连，尤其真挚动人。

## 传记散文的感情浓度

2024年年初，改编自李娟散文集的同名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成为了年度讨论热度很高的现象级文艺作品，“阿勒泰热”伴随了我们一整个年。这是一部少见的由散文改编的影视作品。从情感表现上看，该剧细腻且真挚地还原了原著对阿勒泰土地的热爱。“我”与邻里乡亲相处的种种细节，无论是围坐篝火分享食物，或是齐心协力抵御风雪，都洋溢着质朴而深厚的人间温情。面对生活的艰辛，大家展现出坚韧乐观的态度，在艰苦环境中依然追逐梦想、笑对困境，这种扎根于大地、源自平凡生活的情感表达，正是散文书写的一大优势。在2024年的散文阅读中，此类作品也是收获颇丰。

陈冲《猫鱼》是一部自传体散文，将家族史与个人历史巧妙交织，生动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历程和变迁。“猫鱼”隐喻着那些微小、稍纵即逝又常

被时间淹没的记忆片段，但这些片段既关乎个体命运，也揭示着被隐藏的精神探索与生命力量。因此在书中娓娓道来的不仅是个人心灵史，更是一部聚焦当代女性成长蜕变，彰显其勇气与坚韧的珍贵记录。彭程《杯子上的笑脸》如实描绘了自己得知女儿身患绝症时的震惊与痛苦，详述了长达十多个月的艰难救治，以及女儿离世后无尽的哀痛与思念。书中涉及主题既有对乖戾无情命运和苦难的深刻思索，也有面对绝境仍不放弃一丝希望的顽强抗争。这部作品是对超乎日常经验的苦难经历的书写，作者的感受与思考真挚、强烈且深刻，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关于创痛、生命与人性的深刻之作。薛舒的《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记录的是自己的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后的生活轨迹，不仅是情感的寄托，更是作者以勇气书写下的难忘记录：“父亲”患病后三年时间里，病情不断恶化，从失忆逐步发展到失智，最终陷入失能状态。此后在老年病房度过了漫长的五年时光，直至离世。

这样的文字，因蕴含着真切的质感与浓烈的情感，总能精准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尤其是那些关于故乡、关于父母至亲的篇章。尽管生活充满艰辛，但情感浓度并未因此而削减，反而在回忆的渲染下，越发凸显出感情的真谛其实就蕴藏在日常之中。

## 文化散文的思想深度

正像丹飞的散文集《书中藏有你走过的路》的书名所揭示的那样，阅读的内容常常直接成为散文的题材和出发点，不仅如此，在阅读中我们反思当下生活，感悟历史变迁，探寻人生意义，我们总是满怀期盼，希望阅读中的某些触动将化作时代回响，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赋予我们奋进的力量。

阎晶明的《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范式，以别具一格的视角深入探究鲁迅与中国众多共产党人之间的交往故事。在书中，作者仿若化身福尔摩斯，层层抽丝剥茧，爬梳史料间的蛛丝马迹，将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赓、瞿秋白、方志敏等人的交往故事讲述得跌宕起伏，悬念丛生。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不仅能让我们更深入

地了解那个特殊时代的风云变幻，更能在他们之间从交往升华为“同怀”的相知中获得精神的洗礼。

张锐锋《古灵魂》以163万字的煌皇巨著，为我们展开了晋国历史里众多人物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其向内转的叙述和当代性的写作抱负，让我们看到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在先锋写作理念下，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与深度。郭文斌《中国之美》细致梳理传统文化之美的起源和沿革，展现出其生机和内涵。作者将我们的节庆、风俗、礼仪的起源、生成、普及，与中国人文化品格、精神信仰的形成紧密结合，以此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美感。如书中对送灶神习俗的讲述，体现出古人借助仪式劝诫人们与人为善的智慧；对除夕守岁仪式的描绘，则蕴含着中国人对时间与生命的敬畏。徐泓《燕东园左邻右舍》的特别之处在于让挂着“历史建筑”牌子的燕东园22栋小楼“开口”讲述100年前楼里的住户与往事。书中满是感人的亲情、友情与师生情，重现了先辈学人的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打捞知识分子故事的同时，还着力捕捉燕东园女性的生活点滴。书中写到了陈幼兰、赵萝蕤等十余位女性，她们身份各异，却都在燕东园历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 非虚构散文的鲜活经验

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让我想到苏轼《喜雨亭记》与范仲淹《岳阳楼记》，心怀百姓喜忧，将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升至与天地万物同高的高度，这与杨素秋在图书馆建设过程中展现出的特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西安碑林区挂职期间，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杨素秋在主持碑林区图书馆建设工作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实现了理想与现实最大程度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知行合一的非虚构佳作，也因为作者毫无保留地融入亲身经历于作品之中，大胆且直接地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继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破圈传播之后，素人写作的队伍持续壮大，更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写作者投身其中。2024年广受关注的除了胡安焉的《生活在低处》《我比世界早熟》之外，还有黑

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周慧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王柳云的《走过一座海》等。

素人写作的非虚构散文作品，在生活经验表达与细节描写方面，常常有着超出常见散文表达范围的呈现。在我读来，其中写得精彩的部分，毫无例外地都致力于从最鲜活的经验中，展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纠葛与相互依存。阅读这些作品时，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文学所饱含的朴素且真诚的强大感染力。以胡安焉的《生活在低处》为例，这本书详细梳理了他一路走来所经历的诸多坎坷与颠簸。回过头去看，会发现支撑自己在生活的低落之处依然能够继续前行，并且一步步走上写作道路的，恰恰是“生活的另外部分”，是那些“为普通的事物感到惊讶的时刻”。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描述了“我”与母亲之间的情感纽带，尽管两代人之间或许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真正的相互理解，但通过记录、书写母亲生活的这一过程，却让“我”与母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信任彼此、支持彼此。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书写的是在文学的光芒照耀之下，每个人在各自所面临的困境中，究竟如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向我们展现了普通人在困境中顽强不屈的生命力与独特魅力。

通过行旅、感情、阅读和生活经验本身的书写和回忆，我们在散文写作中看到了文学回应于世界的独特视角。散文观念和其他观念一样，只有不断变化才能充满活力。倘若将一年的阅读时光比作每个人专属的图书馆，那我期待这个图书馆如同碑林区图书馆那样，拥有一份优质的书目单，更期望它能够助力我们塑造更新的自我生命。

随着散文的边界日益模糊，更多创作者参与到散文创作当中，无论是在网络文学平台发表个人故事，还是通过短视频展现独特的生活美学，随着大众文艺逐渐向共创共享转变，由文学跨界延伸所引发的新文艺浪潮，也许正在开启一个创作繁荣的新纪元。我们将满怀期待地投身于新的创作与阅读生态之中，积极学习并探索新兴技术为我们带来的无限可能。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散文世界的版图将继续扩大，面貌将为之一新。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创研处处长)

## ■关注

# 太行文脉两蔚然

——2024年晋旅与鲁军中短篇小说创作观察

□卓一苇

2024年，山西作协和山东作协联合在《青岛文学》开设了“晋旅·鲁军”作品展栏目，一年来推出晋鲁两省24位作家的小说作品，阵容强大，风格多样，既为读者了解当前晋鲁文坛风貌打开了一扇窗，也为作家、评论家深入考量当下文学留下了参考资料。这是对山西、山东两省作家尤其是新生代作家实力的一次整体检阅，这样的跨省合作在当下中国期刊界、文学界并不多见，无论是对文学队伍建设，还是对于长远的文学期刊自身引领力重塑，都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晋旅”参展作品中，陈年《树上有几只鸟》延续了她一贯对小人物的关注，可喜的变化在于写出了小人物的崇高。小说行文紧凑，实现了主题、技法和语言的统一。李苇子《铆钉之夜》延续他一贯的“东北叙事”风格，把人物的感情和性格放在大自然中锤炼升华。小说背景宏大，意蕴深沉，人性冲突在自然之下潜滋暗长，却终归于纯正。阿连《阿木斯河》写两个女人之间的嫉妒，文风冲淡近似散文，却别有一番韵味。陈春澜《同乘》写高铁上的偶遇，简约而隽永，纸短而情长，实现了老主题和新情境的圆融。杨凤喜《虚拟黄昏》描写小人物幻想的破灭，张象《骑鱼的日子》语言散发着钻石般的光芒。

王虎山《青鸾》以短篇幅呈现秦明轩的多重困境，乐曲《青鸾》成为他够而不得的理想生活的化身，沉重的起飞中途陨落，懦弱的出走宣告失败，秦明轩是当下的现代的“多余人”。毕海林《划过天际的云》围绕四眼儿的寻父之路，牵扯出四眼儿、曹永灯、柳青三个少年的生活，客观呈现了上世纪90年代太原郊区生活的一个侧影。梅钰《巴比松》写寻找，想象覆盖现实，现实穿插在想象之中，笔法趋近意识流，但又有着现实主义底色，文字浓烈如油画，镜头切换如电影，跨界融合的特征明显。安小花《一路狂奔》是一出“浪子回头”剧，泼辣的生活气息、运动感十足的情节推进、张扬潇洒的人物设定，使文本呈现出独特的风格。

“鲁军”参展作品中，王威《狼王》是少见的多主题小说，一只母狼使人看清了太多东西，狼王的意义或许不在肉体的强大，而在于精神上的解惑。王玉珏《金秀》巧在布局，行文过半才通过警官点出关键情节，母爱最终还是冲破了自尊的藩篱，情感最终战胜了理智，结尾一声断喝碎心肠。程相松《月圆回乡》跳出“城市—农村”的二元对立思维，以艾莲

这个流动于城市、城郊的农村女性穿插起一幅城乡和谐共处的画面。钱幸《误诊》以语言特色取胜，漫画式的描写、俏皮幽默的言说、讽刺和比喻令人印象深刻。周崇《贺小赫的诗和远方》写爱情和亲情，但更多的笔墨着眼亲情，父母之爱才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在王秀梅《与渺茫对话的下午》中，现实与想象纠缠、错乱乃至发生变形，事实被一再推翻重组之后，更显扑朔迷离，那个下午更像故事得以展开的时间道具。庞瑞贞《黄昏里的石屋》写逝去的农村中难以忘怀的人物，哑巴的爱情故事像那间石屋一样独特坚毅。阿华《耳环》带着诗一般的怅惘气息，耳环代表的是全部的真挚和奉献，标记的是令生者唏嘘的短暂人生。黄浩《易容者》写破产老板的黄粱一梦，得见物是人非。段玉芝《起风桥》的人物塑造打破固有套路，亲兄弟的分道扬镳和同志间的生死守望，令人动容。

此外，还有一些文本值得讨论。留待《零公里》结构复杂，有着现实主义的纹路和笔触，却是现代主义的核心——不可逃脱的宿命，还有悬疑小说的特征。小说以一个梦统摄多个场景——友情、婚外情、利益、故事严丝合缝，情节扣人心弦，描写缜密入微。苏二花《太原杀手铜》在人物塑造上有所突破，主要表现为典型化、系列化、鲜活饱满。小说中的人物呈现出比扁平人物丰满的特点，近似网络游戏中的2.5D视角，也可称之为2.5D人物。柏祥伟《车子驶过拱形大桥》聚焦现代意象，把大桥作为儿子性格成长的试炼场，将当下生活融入小说创作。柏蓝《皎皎兮》从场景的形、色、态、韵出发，结合敏锐自如的主观感受，加之炼句、炼词、炼字的自觉，使一句一段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和波澜，现代生活场景在她笔下有了古典的立体美感。

不论是晋旅还是鲁军，主题逃不出亲情、爱情、友情的经典范畴——这是两省作家不约而同的自觉追求。从小说内容来看，栏目中的两省作家大都追求现代表达，文本的时效性较强，反映和探讨的主题都和当下生活密切相关，比较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体现出作家们的时代意识和当下立场。从表现手法来看，“晋旅”擅长大场景铺陈，善于塑造系列化人物；“鲁军”讲究叙事策略，现代手法圆熟，可谓各有千秋。在不远的将来，由作品展栏目集结的作家们，也许会推动新文学格局的形成，为文学现场带来更多活力与可能。

(作者系山西青年评论家)

## ■新作点评

林朝晖中篇小说《黄连树上结甜瓜》，《福建文学》2024年第10期

# 写出革命英雄的成长性

□张莉萍

林朝晖《黄连树上结甜瓜》在继承与转化传统革命叙事的同时，结合当下对人性与社会的认知，刻画了集英雄崇高与凡人鲜活等特质于一身的主人公鲁大嘴。这与作家林朝晖的军旅出身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对革命英雄的形象与书写。

在传统革命叙事中，参军的主要动因是被剥削被压迫的苦难生活，如《白毛女》中的大春等人。《黄连树上结甜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种情节模式，作者用两个歇后语点明鲁大嘴贫农出身及父母双亡的处境，随即给出了更接地气的理由——部队的馒头好吃。满足口腹之欲这一生理需求，更符合未曾遭受日人侵略的鲁大嘴的心理。新兵训练时，他因饭量大名，曾被战友视为自私之人。到炊事班后，他能够克制食欲，做到先人后己。饭量大小前后的转变，真实地表现了鲁大嘴在革命队伍中的初步成长。从能说会道的农民到勤劳坚韧的炊事员，进而变成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人物“大嘴神枪”，最后成长为令二营战友钦佩的英雄。他参军的内在动力随着成长经历而变化，排长的牺牲和日军的残暴让他坚定了报仇雪恨的信念，爱情的波折与战争的残酷让他转变了先成家后立业的思想，意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有国才有家。

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是文学作品常见的主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加恋爱”小说较为集中地探讨了革命与爱情的复杂关系，茅盾认为这一文学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为了革命牺牲恋爱”发展到“革命决定了恋爱”，再到“革命产生了恋爱”，从进化论的角度确立了“革命”的主导地位。革命者的爱情和欲望常被压缩乃至铲除，仿佛只有远离饮食男女的小我之爱，追求志同道合的大我之爱，才能完成革命大业。然而，对于鲁大嘴来说，爱情恰恰是他革命最大的原动力与驱动力。因为暗恋对象刘彩花的一句“姑娘都爱嫁八路军”，坚定了他参军的决心。舍命相救营长受伤后，与卫生员刘彩花重逢，要求营长做媒，理由是爱情不等人。与常将儿女情长排在家仇国恨之后的革命者不同，鲁大嘴对于爱情的渴望是他

寻找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爱情时，他真挚热烈而又害羞胆小，暗恋的幸福与失落相伴相生。这种内在情感欲望的表达，让鲁大嘴成为了鲜活的个体存在。历经战火洗礼，鲁大嘴将对爱情婚姻的渴望置于战争胜利之后，更真切地认识到先有国才有家。革命英雄的神圣崇高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相融，由此形塑了更符合当代人想象中个性化的真实可感的英雄。

这种贴合当下的想象还在于对英雄肉身存在的关注。一些文学作品有时会将忽视英雄身体的疼痛看作一种献身革命的精神象征。《黄连树上结甜瓜》部分延续了这一传统，小说结尾处鲁大嘴左手残缺，重伤归队后成为全营的英雄。但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许多具体的身体细节的描写，如多次提到鲁大嘴的左手，左手画弧线，是他表达前引人注意的信号；角色扮演游戏时，左手扮演恋爱对象，与代表自己的右手对话。左手是自信与美好的象征，因此，左手的残缺更令人心痛，是美好事物的消逝，一种无法弥补的永久缺憾。小说还描写了鲁大嘴受伤时的疼痛，第一次上战场时的胆怯，战友牺牲时的痛苦后悔自责，这些细节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了英雄身体的回归。特别是炸炮楼时，鲁大嘴用身体将炸药顶在炮楼上，拉燃导火索前，想到对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憧憬无法实现，冷静让他急中生智，用身上的衣物将炸药固定在炮楼上，最终完成了任务，也保住了性命。伟大的英雄是从凡人身上走出的，肉体与灵魂的挣扎体现了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因而英雄的行为才有了更具象化的支撑和表达。

凭借从军经验、对红色史料的挖掘以及对未曾经历的革命战争的想象，作家林朝晖用生动丰富的细节还原了那段消散已久的历史岁月，曾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者，在作家笔下变得鲜活热烈、有血有肉。英雄传奇背后更多的还是普通的日常生活。因而，平凡如鲁大嘴在成长中，一步步坚定了为革命理想作战到底的决心，展现了朴实无华的革命情感和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